

犬养毅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

李吉奎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现职首相被杀,在日本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个“五一五”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在侵华策略上的分歧密切相关。本文拟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就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作简要的论述。

一、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法西斯势力开始出现。日本国内也出现法西斯组织,并且越来越多。起初影响最大的是“犹存社”,它是在1919年由北一辉、大川周明等组织起来的。它的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圣典”。该“大纲”主张在国内由天皇“维护国体”,停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予军人以改造国家的权力。它标榜“反对”资本主义,实行“纯正的社会主义”。它主张对外实行所谓“解放亚洲民族”,建立“世界联邦”。^① 其实质,是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扩张,来摆脱国内严重困难的处境。日本政府、军部,以及社会上各种法西斯分子都赞赏这个“大纲”。

由于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鼓吹与日本统治阶级的扶持,陆军、海军、退伍军人各式人等,从1924年开始,组织了如国本社、行地社、建国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樱会以及由农村青年组成的爱乡塾等。在20年代,法西斯团体有一百多个。到30年代,法

^① 《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第4卷,三铃书房,1964年,第40—42页。

西斯势力更加猖獗,军队内部的法西斯组织与社会上的法西斯政党、社团遥相呼应。由少壮派军人桥本欣五郎等为首在1930年9月成立的樱会,鼓吹“彻底的大日本主义”,主张发动对外战争。日本的法西斯组织强烈要求用法西斯独裁,取代日本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

在30年代初,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对外侵略加紧等原因,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作为法西斯势力中心的军部,因为受不同财阀势力后台的制约,其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分裂成为“皇道派”与“统制派”。这两派在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与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主张方面,并无分歧,但“统制派”主张“缓进”,实际上控制着政府;“皇道派”(以荒木贞夫等为代表)主张“急进”,他们一次次谋划排除“统制派”,控制政府,制造法西斯政变与暗杀活动。1930年1月,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滨口雄幸内阁经与英、美妥协,在限制海军舰艇的伦敦条约上签字。由于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具体掌管,政府无权参与其事,所以军部与社会上的法西斯势力认为滨口侵犯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法西斯组织“爱国社”分子在同年11月行刺滨口重伤致死。1931年4月,民政党若礼次郎第二次组阁。

法西斯分子仍不满足,他们互相勾结,策划建立“举国一致内阁”,并拟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政变,迫使内阁总辞职,然后推举宇垣一成大将组成法西斯势力军事独裁的政府,但此计划因宇垣改变态度而停止。这是“三月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樱会”骨干,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长勇等军部少壮派是中心人物,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及建川美次、杉山元等将领予以支持。国内的法西斯独裁一时未能搞成,活动重心转到了关东军方面。

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元老西园寺公望、首相若、外相币原都曾对陆相南次郎提出过意见或质询,要军部与关东军慎重。但是,关东军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等人十分强硬,在10月2日制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规定,“将满蒙建成独立国,置于我们保护之下”。“从现在起,要尽力促进各种独立运动”。^①由于日军比较顺利地占领了东北全境,另外,美、英等西方强国对日本此举,并未作出强烈反应,这样,日本政府与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意见分歧没有突出起来。

尽管如此,军部的法西斯势力与社会上的法西斯分子对若仍然十分不满。若 内阁迫于军部的压力,不得不在12月11日总辞职。同月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织新阁。犬养内阁以芳泽谦吉任外相,高桥是清任藏相,荒木贞夫任陆相。犬养内阁面临的局面是十分严峻的。新内阁组成的当天,便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口,改行通货膨胀和战争财政政策,加强了对左翼的镇压。尽管如此,右翼和军部仍然不满意。^②

二、犬养毅组阁后的对华外交

犬养毅是日本老牌政治家,自明治以来即活跃在日本政坛上。他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犬养还作为贵宾受邀参加典礼。政友会在当时是日本最大政党。由犬养组阁,据说是西园寺公望推荐的。^③在田中义一内阁里外务省政务次官(实际代理外相)、属于三井系统、与关东军关系密切、众所周知的‘对华强硬派’森恪,在犬养毅组阁过程中,也起了促进作用。森恪在犬养内阁中担任书记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鉴于军内不稳,犬养让得到少壮派军人拥护的荒木贞夫出任陆相,以防不测。荒木是‘皇道派’首领,他的亲信真崎甚三郎中将担任参谋次长。

犬养内阁组建之初,首先是面临‘满洲’问题,包括在事变后是

① 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98页。

②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57页。

③ 久留米清:《斋藤实——体现了平衡感的最后的立宪政治》,日本现代评论社编,孙雷门等译,载《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否扩大侵华,建立伪满政权,进攻‘北满’和锦州,以及对付嚣张的关东军‘独立’的问题。其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将应中国要求派团来华调查的问题。第三,是在1931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侵略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一般著作都说,犬养内阁采取‘不扩大’政策^①,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解决日中之间的矛盾。但是,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犬养内阁是被军部、关东军、海军牵着鼻子走的。当时内阁很难制订出一个为军部所能接受而又能解决中日冲突的外交方案来。

众所周知,自明治时期确立天皇制国家以来,日本政府一贯推行侵华政策,它多次与俄国订立密约,主要是图谋占领东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与图占东北使之殖民地化,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由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少壮军人直接去干的,军部参与其事,但在犬养上台之前,以其为总裁的政友会也不甘示弱,主张强硬论。在准备9月进行的府县选举的过程中,政友会各支部纷纷攻击政府的“软弱外交”,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总裁犬养毅、干事长森恪也到各地宣传,主张“排斥软弱外交”,扮演了宣传战争的重要角色。^② 这就是为什么军部能接受犬养组阁,荒木愿入阁任陆相的原因。

日本学者古屋哲夫引用《现代史资料七·满洲事变》一书所载关东军参谋长片仓衷在1931年12月28日《满洲事变机密策略日志》的记述:“随着政府的更迭和首脑的调动,陆军中央部态度已完全改变。”荒木打的是“解决满蒙问题”与“改造政府”的旗号,成为把军部“革新派”的期望集于一身的人物,“据说,犬养就是因为承

^① 如臼井胜美《外务省与中国政策》。犬养有萧规曹随之意。1931年9月19日滨口内阁会议,决定“不使事态扩展到现在的程度以上”。芳泽谦吉《外交六十年》亦持此说。

^② 藤原彰著:《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伊文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页。铃木正节:《犬养毅——天皇制下政党政治的风云人物》,载《昭和宰相列传》,第44页。

认了这个军部革新路线才成功的”。^① 因为政府与军部对关东军的行动已不再限制了,这就意味着关东军已可以着手实现‘建立满洲国’的方针,而且此方针也成为日本的‘国策’了。

但是,犬养毅组阁之初,政府与军部,尤其是与关东军,在对华政策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牵涉到国际交涉,日本政府,尤其是犬养毅本人,曾经采取过‘不扩大’的方针。由于政府与军部经常是以‘二重外交’的姿态出现,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是不奇怪的。这个阶段的不一致,指的是关东军方面急于要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而犬养毅却设想‘不扩大’,派萱野长知赴华进行‘和平’试探工作。

另一种说法,芳泽外相系犬养的女婿,虽是外务官僚出身,但并不得力。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犬养直接派其心腹去南京,但对森恪等人保密。因此,森恪扣押了给首相官邸发来的一切电文,使犬养得不到任何消息。萱野和行政院长孙科的协议,因森恪的破坏而失败。^② 无论如何,萱野受派赴华,在当时是局外人所不了解而又担负重大使命的一次行动。

三、萱野长知受命来华试探‘和平’

马冢明在《满洲事变与犬养内閣》(《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研究》,1983年,原书房)一文中记载,‘犬养首相试图以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基础,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并遣责(派遣责成之意)与孙文友好的萱野长知密使前赴广州与广东政府首脑研究解决满洲问题。当得知军部始终坚持‘满洲独立’的意向后,孙科、陈友仁等

^① 古屋哲夫:《满洲事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姚仲文译,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② 前揭《昭和宰相列传》。

终于提出了断绝邦交的主张。”^① 这则记载如果没有误译的话，则所记不惟语焉不详，且有多处失实，有必要略加说明。

中国混乱的政局，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有利条件。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方告终结，蒋介石便在江西“围剿”红军。在宁粤分裂的形势下，1931年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翌日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随即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下野。在蒋氏第三次“围剿”失败的同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至12月间，沪、粤方面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蒋无奈，在做了一番安排之后，12月15日宣告下野。是月下旬，由孙科任行政院长，主张抗日的陈友仁任外长。正是在这个时候，新上台的犬养内阁准备与中国讨论“满洲”问题。

据犬养的左右手古岛一雄回忆，犬养毅主张承认中国在东三省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东三省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事实上达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标。故在他组阁之后，背着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② 由于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与陆相荒木贞夫都支持“满洲”独立的主张，所以森恪得知派遣萱野赴华的消息后，一面透露给军部，一面通过犬养之子（犬养健）转告乃父，陆军对此十分愤慨。最后，犬养召回萱野，中止了交涉。^③ 犬养健在1946年6月27日在东京盟军总部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说：“严父毅氏，最关心中国东北问题，计

① 山根幸夫等编：《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指南》，曹志勃等译，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82页。

② 据杨玉清记述，他1931年在日本留学，当时国民党驻东京支部负责人之一朱青选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去见犬养毅，要他想办法。犬养答应要使这件事消灭于无形，办法是从东北调回一批闹事的人，再调一些较好的军人去东北；中国也要撤换张学良。见《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61年，中华书局，第227—228页。

③ 古岛一雄：《老政治家的回想》，1951年，东京，第265—266页。

划对“满洲”事变，绝不扩大，奉天皇命令许可，与蒋委员长进行和平商谈。当时派往南京的密使，就是萱野长知氏。^①这里所说的中国谈判对手蒋介石，当是孙科的误记。那么，主要当事人萱野长知是如何记述的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萱野长知出版于昭和十六年（1941年）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对他这次中国之行讳莫如深。但是，1946年7月1日的《东京每日新闻》第二版上，却以《东北事变和平密使，在成功前，遭军部妨害》的大标题，刊出了萱野对此行的回忆。萱野当时任贵族院议员，年74岁，这个披露，为中日关系史留下了不见于官方正史的一页。下面，引用陈固亭先生的译文，用以补充、纠正前揭古岛、犬养健所述不尽、不实之处。

萱野称：我在青年时代，认为日本与中国非合作不可，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中国革命，倡导中日提携，常给我指教的是犬养毅先生。但是那时的田中内阁，坚持对华武力解决，我非常愤慨，曾警告田中内阁的政务次官森恪说：“日本现在若不反省，将来必走入破灭之途。”森答：“除武力以外，无法解决。”这真使我万分失望。我又同样警告当时参谋本部的支那课长重藤大佐，也无结果。那时我想：“在现在的内阁，谈和平工作是徒劳无益，等待有了理想的内阁，我必趁机行事。”萱野长知至迟到1905年便已与孙中山订交，在此后20年中，他们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萱野对中国有颇深的同情感，是没有疑问的，他想在日中关系交恶情况下做调停工作，确有其善意之处。他继续谈到：

“果然不久（1931年12月12日）我所敬佩的犬养先生降下组阁了。在大命降下的那天，我愉快的到先生家里道贺，他看见我就说：‘喂，马上去吧？’他虽然没有说明什么事，我早会意了。我答：‘就去吧！’组阁完了之后，总理参内那天，我到官邸面会，密商一

^① 陈固亭：《萱野先生与中国革命》，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刊，载《中国与日本》第21期（台北），1960年，第27页。

切。为了预防军部妨害,约定了电报暗号。”萱野又问犬养,是否要和内阁书记官长(森恪)谈一下?犬养表示,这次你们二人(指萱野及其秘书松本藏次)是我密派,书记官长和陆军大臣都不必见面。“这次你们的任务,是今后日本生死的分歧点,切盼成功。”

萱野此行化装更名颇为秘密。据载,1931年12月19日,恰逢军缩会议日本全权代表松井石根与永野修身由东京起程,前往门司,他们便以送行者的身份一同出发,由门司赴上海。萱野搭船访丸,他还将去向告诉了松井。当时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萱野便事先致电居正、马伯援、徐瑞霖等要人,请他们前来码头迎接。抵上海当晚,松井说:“这里有政府的代表重光公使,你可和他见一面谈。”次日,萱野访晤重光,重光说:“目前日华关系最恶,还有和平解决之途吗?”萱野说:“正面交涉,彼此为了面子,互不相让,恐难成功。我是无位无官的人,以同志的立场。恳谈,必可打开僵局。但是我是没有权限的,谈到相当的程度,就要请你负责正式谈判了。”重光表面很赞成他的话。12月23日,萱野抵达南京。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尚未公开发表。行政院长系孙科。24日,在铁道部官邸,与孙科开始交涉。萱野表示:“东北事变的爆发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在要想设法和平解决,犬养总理为此日夜焦虑,希望中国方面也要反省,改变抗日的政策,以实现孙文先生的遗志及犬养总理的宿愿。”孙科很理解他的话,他与居正二人认为日本方面如果有自东北撤兵的觉悟,则商谈必可顺利进行。萱野即将经过电告犬养毅。

但是,对萱野的电报并无答复。尽管他仍然继续会谈,但得不到进一步指示。原来,犬养刚好循例去三重县参拜伊势神宫,萱野的电报被书记官长森恪截获,因为是密电,电文不明,仅知道是萱野所发。“森因此愤怒,蓄意妨害,一面告知军部,一面令重光阻止其行动。日本大使馆的机关报《上海每日》华字新闻,发表消息说:‘日本外务省否认萱野的行动。因之萱野的言动,对日本政府无关。’”

据萱野所述,“关于初次商谈的内容。当时计划:一、日本自东北撤兵;二、由中国派警察维持秩序;三、指定该地为实行三民主义模范区;四、中国派大员常驻东北(居正或邹鲁);五、准许日本移民东北;六、两国各派大使正式谈判(中国居正,日本山本条太郎)。”以后犬养电萱野:“军部猛烈反对,工作恐难进行。”如此,萱野奔走月余,只得悲愤饮泣返国。萱野称,犬养被刺后,他的对华和平工作的事实内幕,才大白于天下。萱野去世后,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消息,还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蒋介石的慰问:“日华缔结人间爱。蒋主席慰问和平密使萱野长知氏。”^①

萱野的回忆,因属于回忆录一类的文字,也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根据其他资料,是马伯援陪同他赴南京。他向居正这位有特殊友情的朋友转达了犬养毅的设想。居正(当时代理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通报情况。据说汪精卫对此非常感兴趣,极力怂恿居正进行和谈接触。蒋介石也支持居正与萱野交换意见,研究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在蒋汪安排下,居正与萱野就东三省问题解决方式进行多次磋商,想研究一个双方领导人认可的方案后,再由中日政府正式签订条约。^②随后的情况,正如前揭记述,犬养的计划为军部所妨害,萱野返国请示。不久,中日两国报纸刊出消息,说刚回国的萱野在神户被日本宪兵拘留。萱野在其回忆中未提及此事,但军部之反对和平解决“满洲问题”,已经公开有所表示了。

军部不顾犬养的和平设想,采取相反的,即‘扩大’政策。在东北,军部与外务省的政策,便经常是以“二重外交”的姿态出现。1931年9月,关东军占领南满铁路沿线城市及吉林以后,进一步是占领北满。10月8日,关东军的空军轰炸张学良政权的临时所在地锦州,随后进兵北满,11月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2月5日占

^① 前揭《中国与日本》,第26—27页。

^② 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领了哈尔滨。这样,日本军队便占领了“满洲”全境。日本政府于是协调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分开“满蒙”与中国本部,由这两部分组成对华政策。

首先是“建立满洲国”的国策化。

军部召关东军代表回国报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奉命回东京,1932年1月5日抵达。6日,板垣同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省共同制定了《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8日,颁发了嘉奖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诏书。该诏书肯定了此前被贬抑的嫩江、辽西战役,这表明由天皇名义宣示政策转变的意义。11日,天皇特予召见,垂询,破例给予指示。12月23日,载仁亲王取代金谷范三任参谋总长。1月9日,荒木的亲信真崎甚三郎为参谋次长。2月29日,小矶国昭任陆军次官。

在板垣等人制定的《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中,对“满蒙”的根本方针是:“期望在帝国的威力之下,使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即将该地区永远殖民地化)。而“当前要使满蒙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由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然后诱导它逐渐具备一个国家的形态。”显然,这些措词是肯定了关东军准备在“满洲”建国是合法的行动。又规定:“帝国的满蒙政策,将来应由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去推行,但当前需要在军队的威力之下实行。”从而规定关东军在东三省有全盘处理各事项的权力。

其次,是确定对“中国本部”的方针:“至于中国本部政权,主要目标是使它对满蒙的一切主张自然而然地趋于绝望。因而,与中国本部政权之间关于该问题之直接交涉,应尽可能采取拖延政策。如最近将来该政权提出直接交涉的建议时,我应提出重新确认大正四年条约和其他一切条约、协议、协定,及根绝反对日本、排斥日货等要求,以对抗之。”上述措词所表达的意思,毋须解释便可了解。日本政府与军部,丝毫无意和平解决“满洲问题”,它甚至还在华北活动建立亲日政权,并将内蒙古并入“满洲国”。

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上述“处理方针纲要”。这是陆、海、外三省共同确定的政策,不过在阁议中对原“处理方针纲要”关于“满蒙”部分作了个别简化与修正(如将“帝国威力下”改成“在帝国援助下”)。^①1月13日,板垣持《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即全力以赴着手建立“满洲国”。作为首相的犬养毅,无疑也是同意这个对华政策的。因此可以说,在此之前军部、关东军与政府是有意见分歧的,而现在,在“满洲”建国,已成日本政府追求的目标。关东军原来是计划占领“满洲”后作为日本领土处理,但后来改变计划,将统治方式定为建立傀儡政权。关东军为贯彻其方针,一方面指使原属张学良的一些大员在各地组织政权,另一方面又将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拉到大连。1932年3月1日,由张景惠等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满洲国”。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伪满的权力,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政府出于对外交关系上的考虑,一时不敢公开承认“满洲国”,而是将占领“满洲”作为既成事实定为其基本政策。3月12日,犬养内阁阁议决定,目前不予承认,但尽量援助这个新国家,以使将来得到国际的承认。^②

日本要制造“满洲国”,又不能不考虑国际的反应。关东军方面便要在上海的日军制造事端,以使欧美列强的注意力转移到它们利权集中的上海来。海军方面对关东军的“成就”也甚有妒意,于是在1932年1月,在上海雇用中国流氓杀死日本僧侣,以此为借端,于1月28日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方面挑衅,这便是“一二八事变”。2月,日本陆军大部队也在上海登陆。日本以保卫侨民的生命财产为托辞,20日发动总攻。日本侵略军遭到十九路军等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被打得四易统帅,狼狈不堪。但是,日本趁势已完全占领了东三省,3月1日,炮制出“满洲国”伪政权,至此,

^① 前揭古屋哲夫,《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第174页。

^② 前揭《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第33页。

上海方面的战事已无必要再打下去了。3月3日，日军声明停战，5月5日正式签订日中停战协定。

‘五五’协定第三条规定：‘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① 该协议的订立，天皇是满意的，但军部认为于此役并未获得多少好处，自然不会乐意，于是成为发动‘五一五’政变的原因之一。

‘一二八’抗战，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救亡热情。曾经与萱野长知谈判的居正，这时致函犬养毅，谴责日军侵华行径。犬养在复信中，表示希望与中国和平解决问题。信中说：‘居君阁下：敬奉高谕，深感仁人忧世之言矣。仆以衰老之身，误当调鼎之任。窃期以此机会，定兴亚之长计，是为孙中山先生之首倡，而仆等之共鸣。希阁下为黄种发挥大手腕为幸。’^② 信中正式提出解决东三省问题方案：撤出东三省日本军队，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废除领事裁判权，承认日本人在东三省有杂居和行动的权利。犬养还告诉居正，将派萱野再次赴南京会商，以期达成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协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萱野并没有来华，犬养处也没有进一步的信息，却是突然传来犬养毅遇刺身亡的消息。

四、‘五一五’事件之发生及其影响

犬养毅虽然在3月12日阁议中同意了《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但他一直反对承认‘满洲国独立’。尽管被军方压倒，并不免被军方所左右，而和平解决日中问题，这种愿望始终没有放弃。这大概是因他与孙中山有长期密切交往，与南京政府各派系首领均有过从，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刻了解的缘故。在世界法西斯日益猖獗，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631—634页。

② 《居正传》，第206页。

日本法西斯势力尤其嚣张的形势下,犬养毅个人是没法阻遏军部的气焰,使日本的国际交往趋于正轨的。所以,他尽管与军部妥协,还是为军部与民间法西斯势力所不容。当时国联所派的李顿调查团正在东北,日本国内发生这种重大事件,当然不能不引起各方注意。

根据芳泽谦吉(犬养内阁的外相)回忆录《外交六十年》所记,犬养死因是:犬养为谋矫正陆军的纲纪紊乱,打算将过激青年将校30人免官。可是,军人的免官权归陆军大臣掌握而不属于首相,因此他与参谋总长闲院宫(皇室)载仁商量,但被泄漏出去,而招致军方不满。至于泄漏的人则为内阁书记官长森恪。在犬养毅被戕后的第二天,森恪曾经对免官问题提到“总理错了!”^① 另据认为,犬养毅被暗杀的直接原因是签订“五·五”上海停战协定。下手的人则为属于过激团体‘血盟团’的海军青年将校。

1932年5月,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江上卓等7人,吸收了11名陆军士官生及十多名桔孝三郎的‘爱乡塾’的农民敢死队,决定发动政变。他们的计划得到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间宪一郎、长野朗等右翼巨头的经济支持。5月8日,犬养出席政友会的关东大会并发表演说,对否认议会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5日傍晚,这伙人袭击犬养首相官邸,杀死犬养。同时,又向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处投掷手榴弹,然后向宪兵队自首。他们还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的传单,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提出“打倒政党与财阀”等口号。^② 企图促成发布戒严令,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法西斯专制政权。

日本法西斯行刺犬养毅的计划,是经过周密策划的。马伯援在犬养被刺后从东京返国,告知居正,萱野长知回日本之后,受到法

^①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② 《现代史资料》第4卷,第99—104页。

西斯分子严密监视。萱野每次会见犬养，旁边都有人监视。犬养对萱野与居正会谈的初步结果表示满意，对和平条件具体内容讲了自己的意见，要求萱野再到中国与居正交换意见。就在5月15日萱野会见犬养从其邸宅出来后一个小时，犬养即遭暗杀。^①

犬养之死，最苦恼的是元老重臣西园寺。在不到半年之前，他为了压制气焰逼人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才把高龄的犬养推荐任首相。本来，犬养在日本政界颇有令誉，他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有过值得肯定的一面，被说成是“宪政之神”，孙中山的朋友，“大正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清贫孤高的政客，英俊豁达的谋士，以及具有东洋信义的民众政治家等。但是，自从与政友会合流（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并担任该会总裁后，被认为是晚年失节。他歆羡首相宝座，参加政友会推倒滨口内阁，从而使军部势力介入政治，加速了否定政党政治的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他本人亦被这股势力所暗杀。西园寺在犬养被刺后曾表示：“必须彻底查明犯罪事实，查个水落石出。”^② 但从以后的事实看，根本办不到这点。“五一五”事件表明，日本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部。政党政治已徒有其名，政党内阁已缺乏权威，他们不可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有力措施，甚至把这些暴行称为‘爱国’之举。事实上，没有军部的合作，政局便无法控制。5月20日，陆军方面又提出对组阁的五项希望，表示反对政党内阁。当时宫廷与政界普遍希望接受军部的主张。西园寺担心政党内阁继续下去，会使国内的对立更加激化，因此推荐比较稳健的斋藤实继犬养任首相。斋藤年高75岁，已处于半隐居状态，他所组织的内阁是军部与政党的折衷内阁。正确地说，政党成员在这届内阁中只是起次要的、陪衬的作用。在西园寺公望看来，起用斋藤可以在牵制军部的同时，促使贪污渎职、内争不已的政党悔悟。但是，他的

① 《居正传》，第206页。

② 《红色贵族春秋》（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田家农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目的最终也无法达到。

“五一五”事件后,右翼气焰日见嚣张。北一辉及大日本生产党、天野辰夫等发动神兵队事件的武装政变,随后袭击若等。1932年12月,大日本生产党、神武会、建国会等30多个法西斯团体组成“拥护国体联合会”。凡此,都表明日本已无可挽救地滑向法西斯专制的深渊。

严格地说,在侵华问题上,犬养属于缓进派,并非站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立场上考虑中日问题。他虽然想“和平”解决日中问题,反对九一八事变的扩大化,不承认“满洲国”,但其政治能量有限。在政友会内部,最大的实力人物森恪,已决心背弃犬养。在这种形势下,想绕过军部与内阁,通过个人的因缘,沟通与南京的关系以解决中日问题,是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犬养之死,使战前日本的政党政治于焉告终,也为孙中山1924年神户演讲中“日本是做亚洲王道的干城,还是做欧洲霸道的鹰犬”的质疑做出了结论。此后日本人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罢了。

“五一五”政变后,日本在扩大侵华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走上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使日本走向毁灭。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世人记取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